

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

主编 彭斐章 副主编 贺修铭



武汉大学出版社

98078

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八·五”规划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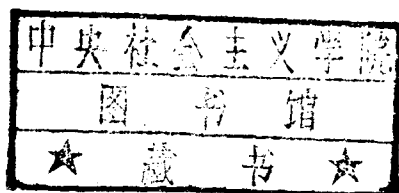


200079431

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

主 编 彭斐章
副主编 贺修铭
编 者 柯 平
何华连
彭耀雄

DI60/11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彭斐章主编;贺修铭副主编.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12

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

ISBN 7-307-02297-4

I. 书…

II. ①彭… ②贺…

III. ①书目工作—情报服务—理论 ②书目工作—情报服务—
管理体制

IV. G257 G257.2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武汉市皇冠彩印厂印刷

(430014 武汉市汉口铭新街79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1996年12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

字数:220千字 印数:2001—4000

ISBN 7-307-02297-4/G·311 定价:9.6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印刷厂调换

书目情报： 跨世纪目录学研究的基点 (代序)

历史的时钟已经指向 20 世纪末端，随着 21 世纪钟声的临近，人们的思想愈发活跃，回眸与反思，预测与梦想，日夜缠系在人们的脑海中，世纪之交引起了感慨万千。

作为世纪末的科学思潮，各学科富有远见的学者无不以崇高的敬业精神，在为本学科筹划着下一个世纪的发展方向。化学家说，下个世纪是化学的世纪，当今化学的地位又确实在扶摇直上；生物学家声言，下个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生命科学的旗帜正璀璨夺目；人文科学家宣称，下个世纪是人学的世纪，这不仅是因为生命科学中“第一位”生命即人，而且生命现象与许许多多其他现象相关，最突出地集中在人身上，人最值得研究^①。在上述现象的背后，蕴含更深的内涵是各学科在寻找未来世纪中的学科基点、制高点和未来走向的方法论上的意义。中国目录学作为一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学科，其历史地位很高。“中国目录学走过漫长的知识积累时期和经验总结时期后，从 20 世纪开始踏上理论目录学时期的里程。20 世纪的目录学在得天独厚的历史契机中走向现代化，发展成为真正独立的科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②如何总结目录学的发展历程，认识其历史地位、成就和局限以及在 21 世纪的未来走向，是任何富有使命感的目录学家都不可推诿的责任。

学科基点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起点，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学科方法论的选择都必须以学科基点为基础，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什么样的学科基点便会产生什么样的理论体系。学科制高点则是指学科研究主体的思维高度和学科研究所要达到和实现的目标。学科基点和制高点一旦形成，便构成学科研究的指导思想，决定着学科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理论功用取向。一个合适的学科基点和理想的学科制高点会将该学科导入科学前沿阵地。面向未来的目录学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学科基点选择和制高点确立的问题。

一、历史回顾

基点的选择和制高点的确立不是随心所欲的，“时代特征必然要体现在作为社会产儿和社会进步推动力量的科学身上，使它具有时代性。科学的整体是这样，各门具体学科也是这样。目录学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③目录学的时代性首先体现在目录学研究基点的选择和制高点的确立上。

目录学作为实践性很强的致用之学，是书目工作和实践的产物，但书目工作实践并不是目录学研究的基点，更不是学科的制高点，因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从来就是一种方法论。然而，目录学研究的基点和学科制高点源于书目工作实践，这是毫无疑问的。

学科基点的选择和制高点的确立因时代而异，往往表现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因素作为一种环境因素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书目工作和实践的中介作用，影响着基点的选择和制高点的确立，从而规定着目录学的理论基础、方法论、价值观、研究范畴与深度、研究重点、研究路向和学术风格等各个方面。

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基点和学科制高点与古代文献生产技术和保存技术的落后是分不开的。由于手抄或刻版印刷文献的复本少、错误多，加之古人那种随意改动和伪造文献的做法，使“文

献整理”理所当然地成为目录学的研究基点，古代学者离开了目录学简直无法做学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古典目录学的制高点，古典目录学发展到清代被尊为学中之学，是与古典目录学研究不失时机地、成功地选择学科基点和确立学科制高点分不开的。

“进入近代社会后，铅字印刷技术使文献的复本量剧增。在新的交流环境中，古代目录学的大部分知识和技能显然失去了作用。这种状况似乎已决定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没落。不论从何方面分析，目录学都不像一个能成为前沿的领域。但是，目录学在经历了本世纪初至20年代的一段沉寂后，在30年代全面复兴了。”^④“各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内多有‘目录学’一科开设”^⑤，“高级中学以上学校，多列为必修课，学子重视，几埒国学。”^⑥从而形成了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塑造了20世纪目录学的辉煌。

对于中国目录学全面复兴和高潮出现的社会背景虽然还缺乏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但有两个因素所起的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其一是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相对世界来说比较迟缓，这样使古典目录学的研究基点和学科制高点获得了延续的空间和时间，古典目录学的生命力也因此得以强化。在19世纪以前，我国出版业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事实，为古典目录学繁荣提供了坚实而肥沃的土壤。“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我国出版业还停留在传统的阶段，西方出版业则已开始向新出版业阶段过渡，机器操作逐步代替了手工操作，出版的行业组织和立法也开始确立，这些作为新出版业的特征在中国的出现，比西方几乎晚了近一个世纪。”^⑦正是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的迟缓，并未使文献数量剧增成为目录学理论和实践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而版本、文献校勘和学术导引仍是从学者必经的首要难关，更兼考据学风的学术背景，以文献整理为基点，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学科制高点的古典目录学仍以其固有的魅力独领风骚，并成为20世纪目录学第

一次高潮的主要契机。从李小缘对当时目录学四个流派的归纳,古典目录学的影响差不多占据了其中的“三个半”,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科学革命迟迟不能在中国发生,使古典目录学理论的近代化难以实现,其研究基点和学科制高点也就明显缺乏更新机制,这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古典目录学的生命力,同时也为古典目录学成为20世纪目录学第一次高潮的中心提供了机遇。

近代化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必须以涵盖一定的历史时期为前提,关于近代史分期,史学界看法不一,传统上将1840年至1920年作为近代时期,后来学者提出应将1949年做为中国近代史的“终止”时期。在把近代化看作历史过程的前提下,如果按照传统的分期方法,我们可以说,中国目录学缺少一个近代化阶段,如果把1840年以后的百余年算作近代时期,以20世纪30年代目录学研究作为标志,我们则认为中国目录学的近代化进程相当迟缓,而且步履艰难。或者换一种说法,中国有近代之目录学,而无目录学的近代化。这是因为,科学的近代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应该是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丰收为标志的。从世界范围看,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革命直接催生了大批新型图书馆和博物馆,书业书目、国家书目、专题书目、联合目录代表着当时书目实践的丰硕成果,由图书馆的编目方法形成的一套特殊的技术和规程以及书目编制上的联合协作和标准化等则是书目实践和目录学理论完美结合的体现,1895年在布鲁塞尔成立的国际目录学学会及各国目录学组织的建立,使理论研究组织化,20世纪初是西方“目录学发展中最革命的阶段”^⑧,也代表着西方目录学近代化的成功。

尽管“1840年以后的百余年间,我国目录学承前清目录学遗绪,文人学者为风尚所趋,纷纷研究目录学,叶德辉所谓研此学者咸视为身心性命之事,在书目、索引的编制和目录学理论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⑨也正如王逸樵所说“论目录学,当以清代为大盛,而其最盛,则又应以近百年为趋!”^⑩藏书、校勘、辑

佚诸家“罔不趋重此道，草偃风流，别树一帜，遂与清季考古研经之学颉颃并称！迄近年来，研究者犹不乏人，蔚然而为一代艺坛重要之专门学术也！”^①显然，中国近代目录学有兴盛和繁荣之状况，而无西方近代化目录学之状态。近代目录学对古代目录学研究基点和学科制高点的秉承痕迹是不言而喻的，姚名达先生所感叹的“时代之精神殆无特殊之差异”^②，何尝又不是对古代和近代目录学一脉相承状况的深刻反省呢？

作为一种客观而又严谨的学术态度，我们应该公正地评价书目实践近代化的成就。李小缘所提及的所谓新旧俱全者，实质上反映了中国目录学与世界目录学潮流的交流和融合问题。尽管我们在前文强调，古典目录学在20世纪的第一次高潮中占据了“三个半”的理论空间。但不能否认，异域目录学的输入，乃是这次高潮形成的重要契机。它对于新旧俱全者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对于书目工作近代化的完成可以说是起了革命性的影响。30年代的引得运动轰动学界，而新的书目分类法的出现和排检法的丰富更使古典目录学的传统四部法和单一的类型排检法受到摒弃，古典目录学书目实践方法的市场越来越小，与古典目录学理论的繁荣所形成的对照反差，映射出中国目录学和西方目录学融合和冲突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悲壮氛围。这是近代中国目录学在百年风雨中经受的第一次近代化洗礼。姚名达先生所总结的“时代之精神殆无特殊之差异”也好，杜定友先生“中国无目录学”的愤愤而言也罢，及至当代学者所称之的“传统目录学的回光返照”，以及概括的“理论脱离实际”之严重倾向，只是平添了30年代目录学悲壮氛围的浓烈。这次高潮因30年代后期中国抗日战争时代的来临也许缺乏足够的时间而夭折，但科学革命迟迟不能在中国发生，从而使古代目录学在近代时期缺乏研究基点和学科制高点更新的催生力量，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认识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公元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的《人体

结构》于这一年同时发表，由此从哥白尼到牛顿这150年的光景，科学所发生的一系列变革，被称之为科学革命。

中华文明古国曾经拥有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这几项被弗朗西斯·培根认作是加速了西方从黑暗时代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最重要的发明，中国在前现代时期的科学技术成就被世人叹为观止。李约瑟博士及其合作者的不朽著作中所记载的证据也强有力地说明，除了最近的二或三个世纪之外，历史上中国在绝大多数主要的科学技术领域，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世界。在前现代历史上，中国的确具有一个非常辉煌灿烂的开端，她的创造力一直保持了好几千年。许多历史学家都承认，迄至14世纪，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她已通向爆发全面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大门，但中国终于未能跨进科学革命的门槛，因而，当17世纪后西方的进步加快之后，中国就远远落后了。鸦片战争，英国人用炮舰打破了火药发明国度的大门，西方技术上的优势给中国带来了屈辱的冲击。自此以后，中国就一直被光荣的历史回忆和现实落后的屈辱所困扰。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对李约瑟之谜的求解，一些优秀的学者包括李约瑟在内已经提出过好几种解释，包括政治经济制度因素决定论、中国技术创造力消失说、技术需求不足论、技术供给不足论、科举制度导致论等几种观点。详论这些已经游离本文的主题，我们旨在说明，科学革命在中国的姗姗来迟，使目录学理论发展必须的科学传统难以形成，从而导致了我国目录学近代化进程缺乏催生动力，这也是30年代中国目录学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古代目录学在书目工作已经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下，而迟滞不能近代化的根本原因。

科学，是理性的事业，作为人类理解客观世界的活动，由此而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提供理论。因此，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必将导致人类改造世界的理论工具的革新和创造。科学革命的成就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体现：其一是它所取得的成果，即各门学科的知识体系；其二是掩藏在这些体系背后的，作为知识母机的

东西——人类理解世界的立场和方法、科学价值观和科学精神。科学革命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塑造相对应的科学传统。科学传统实质上是科学革命的历史沉积物，也是科学革命成就系统的体现，库恩称之为“范式”，劳丹称为“科学研究传统”。一定时期的科学传统是那个时代科学的灵魂，也是科学的时代精神。各时代人们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个时代人们的社会实践方式和状况，以及由其所生成的总的社会精神环境和科学传统。科学传统的功能最重要的是，提供这门学科的基本信念或先决条件，即研究基点和学科制高点。

16世纪至17世纪的科学革命是一场思想领域里用理性和经验取代盲目神学信仰的革命，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说，是一场科学和哲学领域里的“规范革命”，而实质上乃是科学传统的革命，科学从此充当人类思想进程的主角，恰如宗教在中世纪的地位。“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方法论，是科学革命以来两大主要的科学方法论思潮，它们从根本上影响了那个时代的科学，渗透于各门科学中。”^⑬处于同一历史时代经验主义方法论和理性主义方法论以及奉行于科学中的其他方法，其共同的特点是“机械还原论”的思想方法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分析方法，其共同的作用是使实验方法的地位明显上升。正是理性主义者所强调的理性至上和经验主义者力倡的感觉为根本的相互振荡和调谐，促生了新的科学传统，这一科学传统在18和19世纪又经受了浪漫主义（强调人的激情和意志）和历史主义思潮（在自然科学中表现为进化论思潮）的洗礼，终于把西方科学带进了现代科学的新纪元。

西方科学革命对各部门学科的催生作用是划时代的。“知识就是力量”是培根留给人类的具有永久魅力的名言，我们也不难断定，如果没有培根对知识体系的严谨、准确、逻辑化的归纳，便很难设想会有十进分类方法的诞生。

上文之所以用大量笔墨来叙述西方科学革命的成就和地位，

是因为中国正是缺乏甚至没有类似的科学革命，从而使各门具体科学都先天性地缺少一种近代化的催生动力。缺乏诞生科学传统的土壤。尽管中国近代目录学不能像西方近代目录学那样，从科学革命的大背景中获得近代化的动力，但值得庆幸的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人迫不得已的“睁眼看世界”，西方目录学方法和技术输入了中国，在半个多世纪的酝酿过程中，终于成为推动20世纪30年代中国目录学研究高潮形成的动力，汪辟疆、刘咸炘、容肇祖、刘纪泽、蒋元卿、杜定友、姚名达、余嘉锡等一批学术大家对目录学定义、对象、内容和功能等问题大胆审视，实质上是寻求中国近代目录学研究基点和制高点的艰辛探索。当然可以设想，如果30年代以后和平环境更长一些，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目录学理论可能会形成完整的近代目录学理论体系，其理论研究基点和学科制高点就会有近代化的更新，甚至可以让后人将近代目录学史大书特书。然而遗憾的是，近代目录学理论始终未能超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体系，近代目录学理论体系的贫乏有目共睹。作为这种状态的文化思考，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对外部文化的引进，是从西方的“形而下”之器（科技、方法），发展到“形而上”之道（政治、制度、法律、哲学等），在这种文化引进模式下，目录学对西方目录学的引进和借鉴也是首先引进编目分类之法，尔后才有对外国理论的吸收，只是中国目录学引进西方目录学的第二步尚未迈开，战争时代的不期而至，30年代的目录学研究高潮尚未充分展开，目录学理论近代化的使命便无法实现了。姚名达先生弃笔从戎之时，何尝又不带有中国目录学理论不能近代化的遗憾和悲壮呢？

二、现实反思

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目录学，由于缺乏本土科学革命的契机，也就不能形成属于自己的科学传统，研究基点和学科制高点

的更新更是无从谈起，在书目实践日新月异与理论体系陈旧不堪的矛盾困扰中，中国目录学迎来了1949年以后的和平曙光。

此时，世界科学技术已经经历了几次革命，跨入了科学史上的新纪元。科学知识和文献的指数增长，致使文献浩如烟海，面对此情此景，古典目录学的方法失去了用武之地。“50年代起，当实践越来越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时，由于官方意识的影响，我们主要学习苏联，以致于在论著中所举的例子也多是苏联书目，西方和传统，基本上都被苏联目录学所替代和遮掩。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陷入无知和愚昧的黑暗，目录学当然难逃厄运。70年代末，中国从恶梦中醒来，忽然发现自己真的落后了，理论和技术的陈旧，使得我们以久违的心情在本世纪又一次重新看待西方目录学理论。于是目录学研究在20世纪的第二次高潮在70年代末开始酝酿并在80年代形成。这次高潮的核心定会将产生于本世纪30年代，并在五六十年代被扭曲了的中国目录学改造为适应书目工作现代化需要的目录学。”^⑭在这次高潮中，目录学家肩上的担子是沉重的，既要在解决在30年代就已提出、在50年代已经讨论、在80年代又必须解决的目录学的对象、定义、内容和功能等悬而未决的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之后，方能着手理论建设；又要面临西方目录学理论和书目工作技术和方法的日新月异所带来的冲击；还要小心谨慎地处理派生学科或研究领域（如索引学、文摘学、书评学、文献检索等）和相关学科（如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等）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理论研究基点和学科制高点的重新选择和确立。关于上述前三个方面，我们在以往的文章中已经讨论过多次，这里主要论及研究基点和学科制高点问题。

学科的发展一般要经过知识积累、经验总结和理论建设几个阶段。学科研究基点在学科积累时期的最初选择，带有天然性和本能性。而学科制高点的确立则有赖于研究者的思维升华，也就是说在学科知识积累时期，研究者并不一定能感受到学科制高点，可能在进入学科经验总结时期才会意识到，而此时研究基点对学

科制高点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古代目录学脱胎于文献整理活动，文献整理因此作为古代目录学研究的出发点，这种天然性无须多作说明，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总结历经了数代目录学家艰苦求索，才得以形成共识。学科进入理论建设时期之后，由于研究者、参与者的众多，思维差别的存在，再加上学科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差异，以及研究视角的不同，必然会出现学科研究基点和学科制高点的重新选择和确立的争鸣。目录学研究领域关于对象之争，定义之讨论都已证明了这一点，其时，学科制高点和研究基点之间具有双向建构和影响作用。而研究基点的不同和相对一致的集中则是形成不同理论流派的先决条件。

关于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代表性观点有：校仇学包容说、图书说、目录说、图书和目录说、记录与利用图书的关系说等看法，陈光祚同志在50年代提出“目录学是以研究书目索引的方式向读者通报图书和宣传图书的规律的科学。它是由于人类巨大图书财富和读者对图书的一定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和解决这个矛盾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⑮是为规律说。90年代，陈光祚同志又提出“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⑯，可谓文献流说。

从校仇学包容说，我们可以看到古典目录学的余音回绕。图书说、目录说以及图书和目录说明显地带有经验目录学的色彩，以此为对象来构建目录学的理论大厦必然是空泛无物，以此选择目录学的研究基点必然导致理论建设陷入就事论事的境况，而无法完成理论目录学的过程。关系说和规律说用运动和联系的眼光开始切入书目实践的真谛。我们认为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图书资料（文献的信息）与人们对图书资料（文献信息）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目录学研究的对象。我们近20年来所从事的探讨都是以矛盾说为基点的。从目录学发展规律上总结，把目录学的体系建立在更加科学化的基础上；把书目编制法上升到书目编纂学

的高度,使目录学更加理论化;把目录学史深入到学术史的研究,使目录学内容更加深化^⑮,可以说是我们对目录学学科制高点的理性把握。文献流说的出台,是作者对目录学研究对象的再认识,并未动摇矛盾说作为研究基点的地位,只是反映了作者对学科制高点的扩充意识,对于面向未来的学科基点的再次选择和学科制高点的重新确立是具有启发性的。

近20年来,中国目录学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让任何一个参与了目录学建设的学者都自豪地说,我们无愧于时代。我们不仅完成了近代目录学家未竟的事业,使古典目录学走上了现代化的历程^⑯,而且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要求,在更新了研究基点和丰富了学科制高点的基础上,在学科意识上树立了大目录学观;确立了从认识论立意、以方法论开路,进行多元化科学体系理论建构的策略;选择了介入社会生活,面向经济建设的价值取向;并以技术先导为发展动力,沿着整体化之路,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移。这些将构成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特有的科学传统,并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新起点。

三、走向未来

20世纪的中国目录学特别是两次高潮所创造的辉煌,连同它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一道,必将载入人类科学知识的史册。然而,20世纪目录学留给未来目录学家的担子依然沉重。就在80年代目录学研究繁荣之时,作为一种思潮,“危机说”、“低谷说”悄然出笼,虽然它们并不能动摇我们面向未来、重塑辉煌的信心,但它带给我们的思考是深沉的。不可否认,随着80年代研究高潮的临界点的到来,近几年目录学研究有所降温,而索引学、书评学、文摘学、文献学正在悄然兴起,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而目录学知识的普及工程似乎也随着文献检索课作为大学生指定选修课的开设和一系列文献检索教材的出版试用,正被文献检索课所取代。就

目录学本身而言，严格地说还不是十分规范和成熟的科学，它缺乏规范化的词汇和完整的学科体系、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传统目录学向现代目录学转型尚不充分的同时，其赖以发展的社会大环境又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上述任何一个问题都不是能在短期内轻松解决的。值得称道的是，“现代目录学”和“当代目录学”被明确提出了，表明了当今目录学家认识的飞跃，但对它们的内涵、范畴、理论体系、方法论、功能以及其与传统目录学的联系和区别等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混乱，我们提倡多元化的理论建设，但不希望看到杂乱无章的理论体系；我们树立大目录学观，但不可能包罗万象。我们要完成面向未来、重塑辉煌的重任，首先面临的仍然是研究基点的抉择和学科基点的确立问题。

认清未来社会环境和形态是抉择研究基点和确立学科制高点的前提。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双重意义上的一个知识社会：首先，革新的源泉越来越多地来自研究与发展（更直接地说，由于理论知识居于中心地位，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了一种新型关系）；第二，社会的力量——按大部分国民生产总值和大部分就业情况来衡量——越来越多地在于知识领域。”^{①⑨}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则在1980年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三阶段论^{②⑩}，此后，信息社会、信息时代就一直是未来学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以信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信息化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变革为中心议题，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信息研究的热潮。尽管人们对信息还缺乏一致的公认和理解，但信息这一科学概念不胫而走，已成为科学家们手中得心应手的概念工具。有胆识的目录学者已经敏锐感到信息理论和信息社会带给目录学的新气息。“信息理论不仅确立了目录学的理论基础，而且影响着目录学的学科性质，……使现代目录学走出社会科学，它与情报学（科学信息学）和图书馆学都必然是信息学科的重要分支。”^{②⑪}学科性质的转变必将引起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改变。

在关于未来目录学研究走向上,出现了几种思想倾向,除陈光祚教授提出的文献流说之外,朱天俊教授强调应用目录学的作用^②,程焕文同志强调只有站在世界书目编制的高度来重建理论体系,目录学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③,并有学者进一步主张目录学应当以“文献控制理论与方法”为归宿^④。我们曾身体力行,引进了“书目情报”的概念,并围绕它展开了一系列具体的研究工作。

书目情报理论的最初表达是书目交流理论,而书目交流理论又与书目控制论紧密相关,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50年代谢拉和伊根的社会认识论,经过前苏联60年代科学交流思想的改造,70年代发展成型,80年代写进了高等学校目录学教科书。书目情报理论是传统书目工作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新思想,它的出现被认为是目录学理论的彻底革命,结束了国外目录学以具体书目成果为核心的历史。它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创造了“书目情报”这一新的术语,更重要的是寻找目录学新的基点,动摇了传统目录学的思想体系。

书目情报的概念80年代中期引入我国,虽然人们对书目情报的认识还不太一致,但是目录学界正逐渐达成一种共识,书目情报这一概念区别于表示事物的二次文献概念,是书目文献这种具体概念基础上的抽象概念,是书目文献中关于文献及其识别的情报,是关于文献的效用信息。我们认为走向未来的跨世纪目录学,应当以此为研究基点,在此基础上选择好未来研究方向,确立新的学科制高点。以书目情报作为未来目录学研究基点,具有如下意义:

第一,以“书目情报”作为跨世纪目录学研究的基点,是矛盾说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升华,体现了信息时代目录学的本质特征。矛盾说展示了目录学根本目标的因果关系,没有文献信息的科学揭示和有效报导,对文献信息的特定需求的满足便无从谈起,但文献信息的揭示和读者对文献信息的接受总是通过书目文献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因此,书目文献从来就是目录学理论研究的重

心之一。矛盾说提出以后影响了老中青三代人，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使研究者在注意书目文献中介地位的同时，把研究者的眼光引向矛盾两极的研究，近些年来，关于文献信息的揭示理论研究，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共享，读者需求和用户理论的研究都卓有成效。书目情报作为书目文献具体概念上的抽象概念，是人们认识书目文献中介作用——即书目文献效用本质的结果，书目文献作为连接矛盾两极的桥梁和解决矛盾的手段，不是在于书目文献本身，而是依靠其蕴含的书目情报。以书目情报为研究基点，将会使目录学研究处于新的更有利的起跑线上。

第二，以书目情报作为跨世纪目录学的研究基点，必将引起目录学研究者知识结构的更新，催生一批新的目录学研究方法，在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过程中，有利于扩张目录学的渗透力，提高目录学的社会地位。“书目情报概念是目录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深度。书目情报不仅存在于正式的文献交流系统中，而且出现于书评、图书介绍以及一般的学术研究中，它是目录学的一个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存在，是目录学极富活力的表征。”^②书目情报概念深化了目录学的信息科学属性，有利于增加目录学家的信息意识和创造能力，改变单一的定性研究，促使目录学家运用系统、控制、耗散结构、协同学等一系列新方法，建立新的目录学研究方法论，从而提高目录学的社会地位。

第三，以书目情报为基点的目录学研究，将会使目录学融合现代科学的发展潮流，强化目录学的整体化和科学化趋势，培育出目录学理论的新体系。按照科尔舒诺夫的书目情报功能说，在文献与需求者体系中，形式的、内容的和价值的三种关系产生的检索、交流和评价三种功能，将文献检索、文献宣传报导、咨询等活动纳入到以书目情报为中心，以书目情报系统为依托的书目情报服务体系之中。在此基础上促成目录学自身的整合，具体表现在三个层次：①在微观研究层次，对计算机编制书目文献、书目文献情报标准化、书目情报产品与市场、在版编目等书目实践